

读书札记二则

房日晰

贾岛举进士与遭贬考辨

苏绛《贾公墓志铭》云：“穿杨未中，遽罹飞谤，解褐授遂州长江县主簿。”这段话颇费解，盖作者或有所讳，未便把话说透，有意布了一层迷雾，令人有扑朔迷离之感。今之学者，一般都认为贾岛因遭飞谤，未能考取进士，并被贬为遂州长江县主簿。这种解释，考之唐代仕官制度，于理未妥。按唐制进士第后，解褐授官，一般都为九品。作京官即为秘书省校书郎，地方官即为主簿，县尉。走科举道路的人，极难解褐授官。即已举进士，还要经过铨选，方能授官。贾岛既未举进士，又遭飞谤，何以反解褐授官？未举进士而授官，则已属例外，对贾岛来说，可谓侥幸之至，何以言责？主簿比县尉高一阶，授主簿已是优厚，为什么反称责授？然贾岛自称“逐客”，别人则谓之“逐臣”、“左迁”，在愤愤不平的语气中，的确大有文章。如此等等，都令人迷惑莫解。窃以为贾岛未中进士之说欠妥。“穿杨”典出《战国策》，谓射者能穿杨柳之叶。《战国策·西周》：“楚有养田基者善射，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，百发百中。”晚唐唐彦谦《送樊瑀司上归朝》：“恹心频拾芥，应手屡穿杨。”苏绛称贾岛“穿杨未中”而非“射杨未中”，大可玩味：既曰“穿杨”，当已中。“穿杨未中”即“穿杨而未中”。质言之，即已达到录取标准而取消资格。按唐代礼部考试，才堪及第者，即可发榜，送名单中书门下复覆。贾岛本已进士及第因遭飞谤，或为中书门下复中被取消资格。然可第因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之谤言取消其进士资格，终不同于压根儿未中，自当别论，因授职。长江县虽非远州恶郡，然终究僻远贫荒，授长江县主簿含有责贬之意。

关于飞谤，不详所指。至于贬官原因，当时盛行因得罪武宗所致。《唐摭言·无官受谪》云：“又尝遇武宗皇帝于定水精舍，岛尤肆侮，上诤之。他日有中旨令一官，谪去乃授长江县尉。”又后人伪造的《唐宣宗皇帝赐贾岛墨制》流传至今。考之史实，贾岛举进士与授官均在文宗朝，实与武宗、宣宗无与。其实，贾岛得罪皇帝即或真有其事，亦不得称为飞谤。皇帝是国家的最高主宰，他的话就是圣旨，是办事的准则法绳，岂能

云谤？贾岛贬谪，显然不是得罪了某一皇帝所致。

关于贾岛遭贬事，王达津先生说：“贾岛为什么会贬长江主簿，却不像小说中所说的当面顶撞了唐武宗或宣宗，而是敢于上书，得罪了宦官。”（《唐诗丛考·关于贾岛》）贾岛上书，史实无记载，只是推测之词。既是公开上书，为什么会招来飞谤？

关于贾岛遭飞谤事，当时人已说不清楚。他的友人姚合说：“长沙事可悲，普掾罪谁知？”（《寄贾岛时任普州司仓》），与他稍晚的李频说：“忽从一官远流离，无罪无人仔细知。”（《过长江伤贾岛》）“罪谁知”、“无人仔细知”者，处理草率或捕风捉影之谓。窃以为飞谤云云，或为朱叔夜事而起。开成元年“左武卫大将军朱叔夜赐死于兰田关。”（《旧唐书·文宗纪》）这是因为“坐侵年士卒，赃数万，家畜兵器”所致。（《新唐书·殷侗传》）贾岛大和七年有《寄长武朱尚书》，朱尚书即朱叔夜。诗云：“不日即登坛，枪旗一万竿角。吹边月没，鼓绝爆雷残。中国今如此，西荒可取难。白衣思请谒，徒步在长安。”此系干谒诗，当时贾岛白衣，希望得到有力者的推荐延誉，以改变困厄的处境。此诗或为有病乱投医，他究与朱叔夜关系如何，不得而知。然此诗或为进士争竞者反对贾岛的口实。开成二年贾岛举进士，可能因此事遭到忌者的飞谤，以为曾赞颂被赐死的朱叔夜，或与之有某种瓜葛，遂致遭贬。唐代重进士科考试，而每年举进士不超过二十五名，开成之年才增至四十名。为争竞计，士子中品质低劣者，不惜以最卑劣的手段，抬高自己，打击别人，以达到取消别人资格录取自己的目的。如李贺举进士，其父名晋肃，因“晋”“进”同音，别人就攻击他说考进士犯父讳，逼使李贺放弃进士考试而遗恨终生。所谓飞谤，是不意传出的谤言，也就是出乎意料之外的。《新唐书·魏征传》：“征为人臣，不能著形迹，远嫌疑，而被飞谤，是宜责也。”那么，贾岛对朱叔夜的赞颂，如果有人添油加醋地说一番，岂不成为仕途的障碍？事实上，贾岛并未作朱叔夜的幕僚，也未发现朱对贾有什么公开表示，嫌疑毕竟是嫌疑，终非定讞。故不第而授僻远小县的主簿，似乎是一个较妥贴的处理。

《三国演义》与人的行为预测

周凤岗

广义的行为科学,是指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环境中人类行为规律的学科群。包括心理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、经济学、法学、伦理学以及学科中与研究人类直接有关的部分。狭义的行为科学,是指以人为核心的管理学。它运用行为科学的原理与方法研究人在工作环境中的行为规律,包括研究组织中的个人行为、群体行为、领导行为和组织行为,其最终目的旨在达到对人的行为的良性控制和引导,以期有效地调动人的积极性,取得最好的工作效益。可是,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?关键问题是能够尽早而准确地预测人的行为。古人说得好,“凡事预则立,不预则废。”(《礼记·中庸》)“能前知其当然,事至不惧,而徐为之

图。”(苏轼《晁错论》)如果事先毫无准备,临时抱佛脚,必将惊慌失措,一事无成。那么,人的行为能够准确无误地加以预测么?回答是肯定的。世间任何事物都有规律可循,人的行为也不会例外。《三国演义》中的许多故事可以说是最好的注解。

凡读过《三国演义》的人,最敬佩的是诸葛亮。他神机妙算,对人的行为的预测真可谓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。其中最叫绝的是他对魏延的预测和处置。在第五十三回中,魏延初归刘备,孔明即“喝令刀斧手推下斩之。”玄德惊问孔明曰:“魏延乃有功无罪之人,军师何故杀之?”孔明曰:“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,久后必反,故先斩之,以绝后祸。”玄德:“若斩此人,恐降者

《春游郿邑》中的郿邑考

严寿潜等《郑谷诗集笺注·轶诗存疑诗》中录《春游郿邑》,其按语云:

此诗录自孙星衍修《乾隆三水县志》卷一。未知何据。郿邑,唐河东道蒲州猗氏县西南四里有故郿邑,春秋晋地,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四年“军于郿”者是也。雷首山近焉。(参《元和郡县志》卷一二河山近焉。(参《元和郡县志》卷一二河东道河东县、猗氏县)

注者将郿邑定为晋地,值得商榷。首先,此诗最早见林逢泰康熙丁巳重修《三水县志》卷四,又见孙星衍重修《乾隆三水县志》卷一。盖孙沿林旧,未加删削。孙星衍是著名的学者,当不有误。三水县即今陕西旬邑县。既然林逢泰、孙星衍将《春游郿邑》收入《三水县志》,则林、孙认为这首诗中的郿邑在三水县而非在猗氏县西南甚明。此诗虽晚出,然林志仅录有关三水的唐诗四首(李、杜各一首)郑谷《春游郿邑》二首),编者当有所据,非滥收诗文充数者可比。

其次,桐邑从汉建置,一至大唐,县城虽偶有迁移,县名或作三水,但建置一直未废。桐字较僻,作为县名,往往误写作郿。盖因春秋时有郿伯,郿又系邑字旁,故有人想当然地写为郿。将桐邑误作郿邑,此诗即其一例。不能因为误写,旬邑就由陕西关中移到晋西。

其三、郑谷《春游郿邑》诗中涉及的六个地名:峪评、石门、金泉、三水镇、五林村、夫人冢,大多可考。

石门山、桐邑故城(即三水镇),唐人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·关内道三》就有详实地记载:

石门山,在县东五十里。峰岩相对,望之似门。

桐邑故城,在县东二十五里,即汉桐邑县,属古扶风。古郿国也,《左传》云:“毕、原、丰、郿,文之昭也。”

石门山与桐邑故城,在康熙《三水县志》中,也有较详的记载,兹不赘。另外,白虎峪、金沙泉在该志中也有记载:

白虎峪,在邑西北一十五里,即唐郑谷诗“峪评白虎藏岩洞”是也。茂草四围,长峪七折,野境殊为清幽。

金沙泉,在邑北一十五里,其泉出半川溷原之下,《通志》云:昔有人饮此水见金沙灿烂,故名之。唐郑谷所谓“地涌金泉过石门”,即此也。

五林村、夫人冢或为唐时桐邑小村镇、小景点,未能详考。

根据以上三点理由,我以为郑谷《春游郿邑》中的郿邑,即今陕西旬邑县,而非山西临猗(唐猗氏)。旬邑为古豳所在地,郑谷居长安多年,或竟发古之幽思,遂有桐邑之游,留下了《春游郿邑》的诗篇。